

## 「中國哲學史」概念的東來與發展

陳 威璿 (CHEN Wei-chin) \*

本報告針對中國哲學史的寫作，回顧 1916 年以前的日本和 1916 年以後的中國相關重要作品，並對未來的中國哲學史寫作工作進行展望。

從學科體制的角度來看，「中國哲學」和「中國哲學史」的概念發源於日本的明治時期。隨著大學體制的建立，以及體制下的「東洋哲學」教育，使得當時的日本有必要編寫中國哲學史。1916 年以前，松本文三郎、遠藤隆吉和高瀨武次郎三人都寫出了《支那哲學史》，初步決定了後來《中國哲學史》寫作的面貌，也代表日本以西方哲學系統來建構中國哲學史的嘗試。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徵在此時形成，例如在宋代至明代的部分專門介紹朱子學、象山學和陽明學，而不談儒家道統以外的範圍，因為當時的日本學者認為儒家的表現較有哲學性。雖然日本後來在中國哲學史寫作上又發生轉變，但從對中國的影響來看，主要具有代表性的是 1916 年以前的這幾本《支那哲學史》。

回到中國來看，清末民初的中國學術受到日本非常大的影響，在現代化轉型的工作上常常參考日本的作法，知識分子也從日本獲得新的學術資源。例如梁啟超接受許多來自日本的新名詞，倡導讀日本書的重要性，也因為受到日本影響而進行中國哲學研究。又例如王國維早期在中國透過藤田豐八等日本人而接觸西方哲學，並因此研究中國哲學。張之洞規劃京師大學堂時，沒有設立哲學科，王國維對此表示反對，並主張應讓學生學習中國哲學史。這顯示王國維認同日本有關中國哲學的現代學科編制。在這種環境下，中國也開始出現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寫作。第一本作品是 1916 年謝无量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，但這本書只是對高瀨武次郎《支那哲學史》的模仿，原創性極低。這反映了當時日本在中國哲學史寫作上仍對中國有強烈的示範作用。

1919 年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》(後改名為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)是中國自己重要的中國哲學史寫作表現。胡適強調用可靠的方式先判斷史料真偽，再參考西方哲學方式，對中國學說進行系統性的整理，然後觀察學說的變化情形以及與時代間的關係。本書只寫完先秦部分，並未真正完成，且過於重視學說與社會環境間的關係，也減低了哲學性。但由於胡適對方法的思考較為明確，因此也取得較大的影響力。

在胡適之後，更有明確方法意識且影響力最大的人是馮友蘭和勞思光。馮友蘭在未受唯物史觀影響前所寫的《中國哲學史》讓他獲得重要地位，他積極地以西方哲學觀念來解釋中國的學說，用這樣的標準來規定中國哲學的內容。馮友蘭完整地建立了以現代哲學語言說明中國哲學的模式，但他對宋明理學中「天」與「性」的關係無法把握，只以神秘主義來理解，就無法客觀地說明中國哲學的獨特內涵。勞思光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也使用西方哲學觀念來建立中國哲學，但也強調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在於工夫而非知識論，這使得他的研究方法比胡適和馮友蘭更進步。不過勞思光也因此特別重視主體性，太過於排斥宇宙論的地位，不夠客觀。

隨著「哲學」觀念的變化和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，中國哲學史永遠可以進行重寫。未來的中國哲學史寫作，除了繼承以往對中國哲學的哲學性，和時代之關係的探討外，如果能加強與世界性的哲學議題的對話，應該更能具有當今全球化時代下的意義。

---

\*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。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。